

新認識叢書

1948

第一輯 第四種

論哲人政治

李柏年 著

新知書局印行



基本定價

\$ 2.40

論 哲 人 政 治

李 柏 年 著



新 認 識 叢 書

第 一 輯 · 第 四 種

新 知 書 店

新認識叢書

第一輯 第四種

論哲人政治

著

者

李

柏

年

發

行

人

沈

靜

芷

發

行

所

新

知

書

店

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九九弄

香港軒鯉詩道三〇四號

特約經售處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版初月七年七十三國民

中國究竟要往那裏去？如果從鴉片戰爭以後（自那時起，中國就逐漸淪為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直到現在）算起，這問題存在中國人民的當中已有一百餘年；就從戊戌政變時算起吧，這問題到現在也至少有了五十年，在這悠長的歲月中，中國人民就奮起為自己的命運而鬥爭，這當中不知流了多少仁人志士的血，而且越到後來，犧牲愈大，流的血愈多，想不到抗戰勝利後的今天，中國人民仍須要為這問題而苦惱着，兩年多來，中國各階層人士都為中國的出路問題，議論紛紛，爭個不休，作者不揣淺陋，特別在這裏將各方面有關中國出路問題的重要意見，與以綜合的敘述和客觀的分析，以便對中國出路問題求得一個共同的意見。關於這個問題，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可強同；然作者相信，真理只有一個。中國的民族新危機，已因美國的扶助日本復興和干涉中國內政而愈益嚴重了，這一民族新危機嚴重的表現，就是美國帝國主義不僅不許中國人民進行「反美扶日」，愈益暴露它的帝國主義面目，而且它還進一步干涉中國內

政，要使中國人民永遠不得翻身而後已，至於它干涉我國內政已到了怎樣的一個階段，就報刊上所能看到的材料，首先，如最近一期密勒氏評論報所指出，（六月五日），「近幾個月來，美國官吏對中國政府的干涉一天比一天加緊了。新的美援和美援必須全由美人主持執行的規定，使他們有了干涉南京內政的強有力武器。當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時，美國曾相當地公開加以支持。美國官吏中極多人討厭孫科和陳立夫，他們也不惜公開對這兩人表示不滿。」其次，據展望周刊（六月五日版）南京通訊所載：「在張羣未能蟬聯（行政院長），何應欽又堅持不就的尷尬局面下，據說，美方曾示意，新閣揆最好具備下列三個條件：1. 親美而又為美國所信任者；2. 持身廉潔，不會浪費美援；3. 有計劃的善為運用美援；經當局考慮後，認為翁文灝是一個適當人選。」（同樣消息，也曾見五月十九日新聞報南京專電）第三，攜帶着紅色外交官護照的蒲立德在中國東南西北旅行了一個月，據說使命有三：「1. 估定中國所需美國軍事援助的確實數額；2. 自美國外交政策的目光，對設立中美聯合統帥部的可能性，作一初步切實的研究；3. 研究私人對華投資的問題。」（路透五月六日南京電）另據五月十一日廣州國華報載稱：「此次

宋子文氏赴京，爲藉美經濟援華前哨人物蒲立德抵京之便，商洽有關：（甲）建設——

1. 黃浦港；2. 粵東開發計劃；3. 海南開發計劃；4. 城陵磯港之開發；5. 溝通粵桂鐵路。

（乙）基於建設華南之目的，先以蕩平匪患爲主，尤以海南爲最，目前剿匪困難，實兵額所繫，而增加國防，在在需錢，故亦有請撥入援華項目者，並以美方爲保護其將來對華南建設之投資，及控制南太平洋之安全，或將商洽設一大規模海軍基地或空軍基地，以爲協助我國鞏固華南經濟建設之所在地。」第四，「此次河北第十區專員王鳳崗來京，司徒大使對之極感興趣，曾與晤談甚久。」（合衆十一日電）第五，紐約先鋒論壇報十四日評論稱：「援華款項的運用，現在比較起初時至少已有更佳的展望了。……今後政府方面忠勇能戰的將領，或許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而游離份子則將被摒棄。一般更希望國府能運用美援的一部份，按照晏陽初氏等的主張來建設農村。這種計劃可以增加老百姓對政府的向心力，和抵抗共產黨的意志。」第六，紐約時報四月九日通訊稱：「駐華美國軍事顧問團業已向中央政府提出廣泛之要求，包括設計全盤指揮之權以及派遣美軍聯絡機構赴戰地以監督作戰；要求訓練中央政府軍隊之全權，特別對下級軍官之

訓練，以及管理一切軍事設備及給養。」（合衆社舊金山二十一日電）第七，在八十二師馬繼援部與彭德懷作戰小獲勝利後，美國軍事及外交人員飛寧夏訪問者不絕如縷。「二十一日，美駐平總領事克樂伯復飛寧夏，拜訪馬主席，並考察西北情形，約一週返平，克氏不久將休假返國一行。」傳「美國將以美式配備給予回教部隊。」（舊金山二十七日廣播）第八，「蒲立德在平曾與傅作義等廣泛交談。據悉，傅氏曾要求美方將其第一綫部隊全部改成美式配備，而其第一線現有之配備裝備第二線部隊。傅氏並希望所有美式配備最好直接運到天津起卸，交付彼手。」（合衆北平二十八日，載二十九日字林西報）第九，美援執行人賴普漢已啓程來華，其中包括農業專家多人，將與中國農業專家研究「復興」農村經濟之方法。（美聯二十六日電）『（見宦鄉：「從司徒大使聲明說起」，時與文三卷九期）從以上事實，很明顯的看出：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已由局部到全面，由中央到地方，由上層干涉發展到了干涉下層人民的全部生活，這說明了中國民族新危機已嚴重到了怎樣的程度，這也就更說明了中國人民的速起自救，已是急不容緩。中國今後究竟將往那裏去呢？中國人民的出路安在？這就是本書所要解答的。

目次

前言

- 一 中國往那裏去？……………一
- 二 中國又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了……………四
- 三 中國要怎樣變？……………八
 - 一 哲人政治
 - 二 南北朝
 - 三 「同意革命」
 - 四 「停止內戰、重建和平」
 - 五 苦撐待變
 - 六 依靠美援
 - 七 革新運動
- 四 什麼東西妨礙着中國的變？……………三
- 五 誰來領導着中國去變？……………六
- 六 用什麼方法來變？……………六
- 七 中國要變成怎樣的國家？……………六
- 八 新形勢與「新政協」……………七
- 九 歷史的路祇有一條！……………七

一 中國往那裏去？

在今天，再沒有像中國出路這樣的問題，而為每個人所關心的了！

近代中國史上曾經有過三個時期，它給予中國人民以無限的歡欣和鼓舞，是那三個時期呢？第一個時期，是辛亥革命把極端反動腐敗的滿清統治推翻，而建立中華民國的時候，在這時候，人民因為苦於清專制淫威下的苛政久矣，今一旦易「專制」為「共和」，大家以為從此有了出路，其喜悅之情可知。然而，這一喜悅的時間並不長，不久，中國人民嗚嗚望治的熱望便為袁世凱稱帝、軍閥官僚執政以及長期的軍閥混戰所粉碎，中華民國成爲「中華軍國」，人民依然痛苦地呻吟於軍閥官僚和各個帝國主義的聯合統治之下，中國依然是一個半殖民地，於是全國人民對於中國前途好像黑暗一片，又復墮入失望的深淵中了。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發北伐，把北洋最大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擊敗，而佔領湘、贛、武漢的時候，這是一個

革命高潮的時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情緒空前高漲，千百萬的工農羣衆覺醒起來和組織起來了，在這時候，凡革命勢力所至，殘餘封建（包括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銷聲匿跡；帝國主義望而生畏（如英帝國主義被迫放棄漢潯租界），再加以那時在北伐中合作的國共兩黨所提出的進步的政治主張，如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農生活、實行二五減租以及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的完全自由等等，大家以為中國這次革命一定是可以成功了，所以全國人民大多數以無比的熱情來歡迎革命，為的是中國從此可以走上軌道，人人可以過着安居樂業的和平生活。然而誰也沒有料想到這次革命功敗垂成，國共分裂，中國資產階級退出革命，接着是軍閥混戰和十年「剿共」內戰，結果是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剝進中國來了，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迫於眉睫，全國人民都陷入「朝不保夕」的苦悶中，幸而最後國共再度合作，聯合全國人民及黨派共同抗日，這才把人民對中國前途的希望，又復逐漸地恢復了過來。第三個時期是在日寇投降不久，各黨派在重慶為解決

中國問題而召開過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這時中國人民確實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高興，爲什麼？這因爲：第一，百餘年來外來侵略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已被取消了，中國人民反帝的任務基本上已告完成；第二，對內則用政治協商方式，初步解決了國共兩黨長期間的糾紛與對立，而政協五項決議則爲未來新中國政治建設大致具體規定了一個程序，未來新中國的遠景已經在望，因此，當時全國人民具有一種生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爲真的有了出路，前此憂懼內戰爆發的愁眉苦臉的姿態爲之一掃，同時，這也正是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的一個高潮時期。然而，曾幾何時，因爲美帝干涉中國內政和政協決議的全被撕毀，國共和談破裂，民主受到摧殘，中國內部就又爆發了空前慘酷的長期內戰，這樣，全國人民便又被打入痛苦的悶葫蘆去了。

3
這個殘酷的內戰，到現在說來，已經進行了快有兩年了，以前當權者本有長痛不如短痛的豪語，以爲戰事頂多三個月到六個月就可以結束；但現在看來，內戰決非一時短痛可了。於是關心國事的憂時之士，就又紛陳解決中國問題的意見，這當中有學者名流

的意見，也有政治黨派的意見，特別是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感覺敏銳，對時局意見，發言尤多。怎麼辦？中國往何處去？怎樣解決中國問題？這差不多已是近年來普遍的呼聲。就中國的現狀而論，中國今天也確是到了如同迭更司所說的時代，這就是：「它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它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它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它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它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人們的前面充滿着各樣的事物，人們的前面又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升天堂，人們又在直下地獄……」（見「雙城記」開篇語）因此，中國出路問題的解決，已是急不容緩。

二 中國已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了！

不僅這樣，而且當權者內部也發生了嚴重的危機，這更促使中國已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了。

關於當權者內部發生危機的事實，即政府當局亦不否認，至於有關是類危機的報導和批評，則散見於各報章雜誌的，可謂「俯拾即是」，多得很！例如有人說：「以目前的現狀論，凡歷史上統治者所遭遇的危機，幾已全備。同時又加上現代的種種苦惱問題，如經濟病和政治病兩種，尤其是國際環境的牽掣影響，真是苦惱萬分。」（「觀察」四卷第八期，孫克寬：「重演歷史？創造歷史？」）一般說來，現政府的危機是由軍事上的危機所引起的，所以「從整個看，政府所處的局面是一個下坡的局面。但是政府面對這個局面，它將如何應付？我們就各種事實看，我們看不出政府有什麼辦法。我們和政府或接近政府的人談談，也聽不到他們有什麼辦法。死硬的人高喊戡亂；消沉的人，搖頭嘆嘆氣；想做一點事的人，都說苦悶，說打不是辦法，不打也沒有辦法，祇好在本身崗位上盡力盡職。這三種不同的答復，就構成了今日中國這樣一個混亂、苦悶、消沉的局面。」（同上三卷二十四期，觀察記者：「歲寒談大局」）現政府在這種沒辦法的情形下，不用說，只有拖！但是辦法既然沒有，拖也是拖不下去的，因此「在這種拖不

起的局面中，各種情形越來越壞，社會危機所表現的程度也便越來越深刻。經濟方面一點沒有辦法，物價一級一級的跳，人民受不了。人民受不了，社會秩序便不穩，可能出亂子，要影響到政權的存在，所以不得不今天想一個辦法，明天想一個辦法。可是，這個辦法既不通，那個辦法也不靈，辦法儘管想，物價照樣漲。現在中國，可說人人苦臉，個個怨氣。」（見同上）這股怨氣自然都出在現政府的身上。然而今天在現政府統治下的政治情形又是怎樣的呢？「表現於事實的，中庸者是潔身自好，不與現狀妥協，度其安窮樂道的生活；柔弱者則頹靡消沉，無以自奮，日以繼月，月以繼年，而歸於庸懦；偏激者心難甘服，揭竿而起，被逼走上梁山。因之，國家盡失棟樑，社會無復正氣；可是，另一方面，行險徼倖的小人登場了，顛覆沓泄爲事的官僚上台了，剝削民脂民膏的豪門逞強了，投機取巧的政客稱霸了，他們步步登雲，竊據高位，到處驕詐虛僞，貪污玩法，蠅營狗苟，排擊善良，把國家統治到極脆弱，對人民施力而不施德，全國各地充滿了飢饉、失業、貧窮，戰亂的愁雲慘霧，言論自由是根絕了，那裏有是非黑

白。」（見二卷一期「改造評論」，方秋葦：「如何收拾人心？」）這就是現政治下的現狀，由於這種現狀，致令「今天的人心，降落到零點三十以下了。」（同上）今天政治上的糟，就是當政的內部也無法不承認，立委劉不同、黃宇人、郝志厚、梅恕曾、侯庭督於五月十七日發表談話稱：「現在國民經濟已陷於崩潰中，民生凋敝已極，這充分證明了過去的政府腐化無能。過去政府在人民之前所表現的是：（一）不守法。例如郵資加價未經立法院通過，利用國務會議竟而辦了……（二）不守諾言。過去政府的施政方針，都是點綴的文章，好話說盡了，壞事也作盡了。（三）代表少數既得階級的利益，而忘却了全國人民的生活。（四）政府與人民脫了節；因為這批人民大都是來自官僚市場，而不是來自民間，他們早不知道民間的飢苦。」（見五月十八日上海大公報）因此，就有人高喊「這是危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危機。」（見同前「改造評論」）其實拆穿來講，這不過只是統治階級的危機而已！那末，怎麼辦呢？「一切需要變革，唯有變革，可以挽救時局，收拾人心。」（同上）而且，「我們要求變，以變才能應

變」這是立委劉不同等的話，上海半官方的大公報社論上也說：「人心思變」、「應該變了，慧眼人應能燭於機先。」（五月三日）這就是說，現政府必須「變」，它才能應付那廣大人民的變，這可見當權者一向堅持着「以不變應萬變」的那一套，自己也感到已經是行不通了。因為「中國當前的局勢，已屆山窮水盡，正需要「變」。」（「觀察」）

一方面是中國廣大的人民活不下去，在那裏要求「變」，而且正在「變」着；另一方面是現政府面臨着「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危機」，它已經統治不下去了，爲着挽救自身的危機，也需要「變」，這說明現中國確是已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

三 中國要怎樣變？

但是，今天中國需要怎樣「變」，這是問題的中心，當我們接近着這個「中心」的時候，問題就多了，年來中國的政治家、知識界及所謂「謀臣策士」就這個問題發言

的，真是「風起雲湧」，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然而，真正接觸到中國問題的核心，也不能說沒有，真理是愈辯而愈明的，而真理也只有一個，究竟誰是代表着今天中國出路的真理呢？借用一位巨人的話來說：「研究誰是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革命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爲了加強對於中國出路問題的認識，這裏，我們必須把各方面對解決中國問題的重要意見來綜合的評述一下，看看這些辦法是否行得通？

（一）哲人政治

首先，我要說一說梁漱溟氏的哲人政治，梁氏近年來的救國主張，頗爲接近民主同盟，所以他才參加民盟，後來因國共和談失敗，梁氏對民主却又懷疑了起來，哲人政治主張的提出，可以說，就是民主的一種反動，梁氏以爲民主不能實行於中國，「試看，歷史長久文化昌盛如中國，農民暴動類似革命之事雖屢見不鮮，而從不聞民間起而作參

預政治的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這就根本不同於西洋。」因此，他主張哲人政治，什麼叫做哲人政治呢？就是中國的政治必須要有高明深審的哲學家來負責領導，爲什麼呢？因爲據他說：「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哲學家這裏才能疏解溝通，無所凝滯，而後在各方面照顧之下，抄取一着。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總而言之，我們今日建國，決大疑決大計，天然是多數人接受少數人的領導，普賢尚智，而不必衆。一般所謂民主，於此皆不相應。」（見梁著：「預告選災，追論憲政」，觀察三卷四期及五期）梁氏的哲人政治實在是無視人民、脫離現實，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一種幻想，而且他的這套理論還有被人利用來維護專制獨裁的危險。所以北大教授樊弘駁斥他說：「梁漱溟先生的系統的或正面的政治理論，雖然我們尙未看見，但他的系統的政治理論的面影，我們已看見了。他的面影是什麼呢？是要由少數的高明深審的哲學家，來製出一個救國大計，並且這個救國大計，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可是對於這些高明深審的哲學家的取得收益的方式則未一字提及。假如世上竟有一

些哲學家，他們雖然在一方面，把哲學也學得極其精通，可是在他方面，他們却也係特權階級的代言人，或極易與特權階級謀妥協，如像德國的黑格爾，極力擁護普魯士政府，尼采極力擁護超人，澳地利的全權主義社會哲學家史盤極力擁護納粹，和中國的康有為極力擁護滿清政府。他們在哲學上均有極大的造詣，假令現在他們均一一現身於中國，而為梁先生所賞識，叫他們來給中國製定一套救國大計，在製定之時，並只許他們極少數人討論，而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是不是就可救中國呢？假令不幸中國的救國大計，果由這一類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製造並強制的付之實行，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迅速滅亡而已，尙何救國之有？我不是說，梁先生所指的哲學家就是這一類的哲學家，我的意思只是說，哲學家也可分為兩個絕然不同的門類，其一是專以擁護特權階級的利益為使命的哲學家，又其一是專以擁護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為使命的哲學家。假令不把這一點分辨清楚，徒然提出一個空洞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的口號，我所最耽心的，就是恐怕不幸中國落入在這些代表納粹思想的哲學家的魔掌下，而把中國淪為德國第二，或把中國永

遠沉滯於半殖民地的階段而永不得翻身。漱溟先生！我真害怕得很啊！不知先生亦會看出這點危險否，我看太危險了！太危險了！太危險了！」（見「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觀察三卷十八期）從樊氏此文，可以見對梁漱溟氏所提出「哲人政治」反響的一斑。

（二）南北朝

梁氏提出的「哲人政治」，因為沒有觸到解決中國問題的現實，所以也就並不爲人所重視。現在讓我們來談一談南北朝。什麼叫做南北朝呢？就是當內戰打得如火如荼，難解難分之際，有些謀臣策士認爲這樣的打下去，兩敗俱傷，還不如國共分地而治，互作和平競賽，如同過去中國歷史上的南北朝一樣，這就是用所謂「南北朝」來解決目前中國問題的一個辦法。提出南北朝這一個名詞最早的是大公報主筆王芸生氏，王氏曾說：「南北朝，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照他看法，「半個中國，烽火連天，無論高潮低

潮，緊打慢打，一個南北朝運動，是在有力的進行着。這是中國時局前途的一個去向。」（見王文「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觀察創刊號）接着便有一位歷史學者徐炳昶獻策，勸現政府「改取守勢，不易防守的據點自動放棄，調整兵力，據守重要據點，改變戰略，穩紮穩打，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因為在守勢之下，「財政赤字即可彌補，鈔票即可停發，物價即可穩定，公教人員的待遇即可合理調整，而貪污的風氣，也就不難遏止。此時減租減息的溫和社會主義，也就不難實行。在政府方面，吏治已經清明，社會已經安定，共產黨再想在政府境域裏面伸手，即成了不可能的局面。」（見徐文「試為政府借箸以籌」，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上海大公報）這其實也就是企圖維持一種「南北朝」局面的思想，此外，主張南北朝的還大有人在，理論上多半是大同小異，不必例舉。

南北朝在事實上是否行得通呢？很多的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南北朝只是統治權的鬥爭，與今日政權和民主的爭取大異其趣。統治權的鬥爭過程，到了誰

也不能打倒誰的時候，只有各守原有的防地，互相窺伺。中國歷史上已經出現了不少的這種場合。但是當前的形勢是錯綜複雜的，被不同的信仰和勢力打破了固定的空際範圍。例如中共原來建立在陝甘寧的邊區，但極南的廣東和海南島也有過他們的勢力。」（陳旭麓：「我們向那條路走？」觀察二卷廿一期）而且，就政治經濟的條件說，一個南北朝的劃分，也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現代立國的要素，一、人力，二、土地，三、物資，四、交通，五、一以貫之的修明的政治——民主的全民政治。」

「現在我們來就五點分析今日之中國。

「一、就人力說，長江以南，人口密度高於江北，可是以土地面積論，長江以北的土地面積却大於江南。兩兩拉平，也許誰都不吃虧，可是問題在於人力之運用決定於政治，要是不爲所用呢？假定說，江北的地主土豪劣紳買辦軍閥貪官污吏黨棍子們在北朝混不了，溜到南朝，光着身子，帶着無底的胃口，南朝的力量是否養得了？南朝的人民是否受得了呢？反之，南朝當然有更多的人想望着自由天地硬要投北，那時是用兵力阻

截呢？是用護照制度封鎖呢？還是往來聽便呢？如果無適當辦法，那只好用秦檜的話了。宋高宗和金講和後，發生了一些人的國籍問題，秦檜的原則是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宋高宗就問他：「朕北人，將安歸？」於此，我們也要問：政府的要人和將軍們，如孔庸之先生、舊西北軍東北軍的將領們，大多是北人，他們到那裏去呢？山西王閻錫山是歸南還是歸北呢？共產黨裏有很多湖南人四川人，毛澤東先生就是湖南人，他算南呢？算北呢？

15

「二、就土地說，既然分家，家常就要分清楚，怎麼分呢？是就現有地區，實言之，互相承認既成事實呢？還是請聯合國來劃界呢？以長江淮水爲界呢？以黃河爲界呢？而且，分家是要大家承認的，萬一一方情願，一方不肯又怎麼辦呢？而且，即使雙方都同意了，作爲國家之主的老百姓不肯又怎麼辦呢？再則，還是照人口一半平分呢？還是照土地一半平分呢？退一步說，如策士論客們的妙計，自動放棄一部份地方，這是不成問題的，共產黨自會笑納。可是不肯放棄的大中據點，而共產黨必欲佔領之，那又

怎麼辦呢？再說，你不打，我打，我不打，而你又打，又怎麼辦呢？歐洲的鐵幕，只存在於文字上宣傳上，中國是否能建造真的鐵幕，用論客們的天羅地網把雙方完全隔絕呢？

「假如都不能，那麼，南北朝也就不可能存在。

「三、就物資說，概略地說，煤鐵油三大礦產都在北方，東北的物產尤其豐富（不是傅斯年先生說過東北是中國的生命線嗎？）南北朝假如能成事實，而北方又有海口可以和外國交通，構成物資交換，南方呢？是否一切都仰給於美國？

「就這點而論，共產黨或許肯，如王芸生先生所說的，國民黨也會甘心情願嗎？假如一方面不肯，那麼，南北朝之說是癡人說夢。

「四、就交通說，貫穿南北的兩大幹線津浦平漢鐵路大半在東北，東北的鐵路線尤其多而長。無論是長江或黃河爲界，一家都可抓住一邊。假如分裂了，一條整個的鐵路豈非要一家一半？結果，交通不交通了。水道呢？像黃河那樣年年鬧水災，你管我不管，甚至我修你破壞，又怎麼辦？空運呢？是否也像和英美訂通航降落互惠條約那樣？

既然有這麼多困難，那麼，南北朝如何建立得起來？

「五、就政治說，王芸生先生的看法有一部分道理。在政協時代，共產黨也許在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小康的局面，可是國民黨不肯，把政協的協議連根挖掉了。爲什麼？因爲國民黨政府最怕的就是和平的政治競賽，一個前進，一個落後；一個爲人民，一個反人民；一個精兵簡政，一個多兵蠹政，一個勵精圖治，一個貪污腐化；一個努力生產，一個破壞生產；一個爲人民所愛，一個爲人民所恨；一個區域裏平平靜靜，一個在不斷的鬧米潮、學潮、工潮、金潮、政潮；一個爲國際人士所稱道，一個相反，連朋友都在罵壞政府，扶不起，幫不好；一個自力更生，一個不靠外國就活不成。這樣的對比，在戰時尙且如此，一旦和平局面展開（理論上的，即使是暫時的）如何得了？又如何是好呀！

「就政治而論，南北朝局勢的造成，對中共有利而國民黨是不利的。但是，更進一步，恐怕中共的遠景，不是局促一隅，而是和平統一了。國民黨呢？縱然在軍事上經濟上很想，而且一相情願，要求一個如徐炳昶先生所建議的局面，可是，他們自己對政治

已經完全失去信心了，戡亂、討伐、巴着美國主子，還可以掙扎幾時，一放手，就滿盤皆輸了。不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而是到了黃河，還希望有人去一個救生圈，掙扎上來喘一口氣，多活幾分鐘。不是不見棺材不落淚，而是進了棺材了，還要打強心針。就這點而說，共產黨容許肯，國民黨決不願，那末，南北朝又怎樣搞得成？」（見劉勉「論南北朝」時與文一卷廿二期）

顯然的，如上所述，所謂「南北朝」是此路不通的了。

（三）「同意革命」

此外還有一種所謂「同意革命」(Revolution by Consent)的說法，什麼叫做「同意革命」呢？就是一方面人民要求變革，一方面則統治者接受人民的要求，同意變革，來一個「和平轉變」，這樣，就可以「化干戈爲玉帛」了。這就是「接受現實，放棄一切，安排一個嶄新的局面到來。」（「觀察」）這也就是樊弘教授所說的一條人道的路，他

說：「人道的路是剝削者階層，以一種懺悔的姿態，拋棄剝削的權利，宣布下野，而使戰爭停息，和平降臨，生產增加，分配平均，罪惡減少，幸福無疆。」（樊文「只有兩條路」，觀察四卷七期）但這是可能的嗎？當權者會自願放棄他們的特權嗎？所以郭沫若氏說過「同意革命」嗎？我們也能「同意」，但要問「革命」的對象同不同意。……前年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不是大家都同意「以政治方式來解決政治的糾紛」嗎？然而會議剛一結束，接連就用叫囂、打撲、搗毀，來把一切決議撕毀了的，接着，依仗外國的大力，竟不惜掀起了大規模的內戰。在政治協商會議的當時，的確是有過「同意革命」的希望，當時有些好心腸的朋友也曾衷心為我們慶祝過。然而那樣的局勢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就是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同意革命」，事實上證明是做不到的，因為「好心腸往往是無補於事的。儘管你就同意不要階級鬥爭，然而相對的階級偏偏不同意，一定要和你鬥爭。」（見郭文「歷史的路只有一條」，上海國訊周刊第四五六期）

(四)「停止內戰，重建和平」

「同意革命」既不可能，那末，革命勢必要以武力來求得解決了，這也就說明了中國內戰的不易結束，有很多的人至今還不認識這次內戰的意義，而主張「雙方停止內戰，重建和平」，有的認爲目前中國內戰，不過是國共兩黨的武裝鬥爭，與人民無關，施復亮氏就是這樣的看法，他說：「在政治上，有兩個武裝政黨從事空前猛烈的武裝鬥爭，一個憑藉武力來保持政權，一個依靠武力來爭取政權，以致戰禍蔓延，生民塗炭，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得到解決。」因此「中國人民，爲着自己的生存，爲着國家的前途，都非趕緊起來，積極挽救這種命運不可。」（施文「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展望二卷三期）有的認爲內戰發生，僅是由於少數政治家的野心，所以「人民應當發揮其力量，強迫政治家來運用其自制力，以限制其野心，然後才有避免內戰或終止內戰的可能。」（楊人楨「內戰論」，觀察四卷四期）這認識和施復亮氏對內戰的看法，實際上是差

不多，因為兩者都把內戰看做與人民無關。有的是純從軍力上來看內戰的，說「國共雙方任何一方要想完全消滅對方，事實上都不可能。」所以，「從客觀情勢上看，從遠大的前途上去看，中國內戰問題的解決，既不能由國共雙方單獨消滅對方，也不能讓內戰長此拖延下去，而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及早停戰，最好是立即停止內戰，恢復和談，無條件的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周綬章「內戰問題究竟怎樣解決？」一九四七年五月廿八日上海大公報）有的是從內戰本身來反對內戰，因為「內戰是人間的悲劇，內戰的「勝利」屬於那一方面且不說，可是它的趨勢明白，廣大的人民是失敗了，內戰招來的社會動亂，經濟破產，失業與離散，直接遭受災害痛苦的仍是人民，是廣大的人民。」所以「挽救當前國事危機的重要方案，是停止內戰，重建和平。」（方秋葦：「如何收拾人心？」改造評論二卷一期）而且「長期內戰往往會斷送一個民族的政治生命，至少會使此民族停留在落伍的階段。從歷史上看是如此，從現實上看亦無例外，現今仍為內戰所苦的國家，決不是進步的國家。」（楊人楩：「內戰論」，觀察四卷四期）

另外還有許多大學教授也曾提出「反內戰，要和平」的要求。

要解決中國問題自然應首先停止內戰，而內戰到最後也終有結束的一天，但如上面許多對內戰的認識，和僅從內戰本身來反對內戰，這只是抓住一些現象，而沒有把握到本質，換句話說，內戰不過是一個果，要解決內戰問題，必須要將內戰的原因找出來，否則內戰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內戰一般是怎樣發生的呢？「歷史科學告訴我們，任何戰爭——不管是對外戰爭，抑或是對內戰爭——都決不是出於一二野心政治家的好大喜功，或一二政黨的爭權奪利，而其實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定的社會制度下的社會矛盾的暴露，是解消這個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一種催生新社會的手段。」「大抵在一個國家的舊有社會組織，用社會科學的術語來說，（也就是生產關係），變成了束縛其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的時候，爲了解放生產力起見，首先必須推翻舊的社會組織，廢除那些落後的生產關係。一方面新興勢力要脫穎而出，另一方面舊的既得權益階級要死命抱住政權不肯鬆手，在這種情形之下，很容易發生武裝鬥爭，這個武裝鬥爭就是所謂內戰。」

（范承祥：「內戰論」，國訊第四五六期）

至於內戰究竟是有助於抑有害於這個國家的進步，「我們第一個應當注意的問題應該是：究竟這個內戰是維護既成的腐朽社會組織的呢？抑或是催生新的進步的社會秩序的。如果內戰的結果是舊社會組織的維護者得到勝利，那原有的社會生產關係依然是繼續束縛着阻礙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上）那末，社會鬥爭就仍不可避免，新的內戰終必爆發。「正因爲內戰是一種社會矛盾的暴露，是解除這個社會矛盾的手段，所以不是「當事者發揮自制力以限制其政治野心」所能終止的。人民在這樣的內戰當中，事實上必須選擇一邊，要末就是爲維護舊社會組織而戰，要末就是爲催生新社會而戰，這當中很少有中立的餘地，更無袖手旁觀的可能。真正的人民只會發揮力量來加速新社會的誕生，斷沒有希望新舊兩種勢力打個平手的道理。」（同上）這是說，在這新舊社會矛盾沒有澈底解決以前，那種「希望內戰不分勝敗立即停止論」的想法是不可能的，「當然，沒有一個人不希望早點和平」，「可是愛好和平是愛好永久的堅實的和平，而

不是祈求一種廉價的武裝休戰。」因此，「當雙方正在猛烈決鬥，勝負未見分曉的時候，要雙方發揮自制力停止戰鬥，那簡直是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就在今後也不可能有的。」而「所說人民應發揮力量強迫政治家（或政黨），運用其自制力以限制其政治野心的希望，這根本是一種虛幻空想。」（同上）

（五）苦撐待變

中國的內戰目前既無法結束（這除非雙方的勝負，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已見分曉），於是就有人寄中國出路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了，這特別是頑固份子和好戰派，他們是「衷心盼望第三次大戰早日到來的，這批人在目前世界新形勢下面，在自己日趨沒落的現狀下，已深刻感到毫無信心，感到極度的恐慌。他們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美國的金元與原子彈；他們愈沒落愈恐慌的時候，便愈急切盼望美國的金元與原子彈早一點發施威力，早一點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來打敗他們面臨的威脅，來挽救他們垂死的命運。」

（見梅碧華、貝遜、石嘯冲著：「世界的逆流」）在這批人當中，胡適也就是一個，他在南京金陵大學邀集的各大學校長座談會上說：「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我們要苦撐待變，撐得起，等到世界局勢一變，就會好的。」（見四月廿一日上海時代日報）拆穿了說，胡適的所謂「苦撐待變」，就是希望現政府儘可能的設法拖下去，把「亂」戡下去，只要等到以美蘇爲首的第三次世界戰爭爆發了，「希望原子彈來把胡適之的敵人都炸光，那時胡適之的「就會好的」，這就是胡適之的「樂觀主義。」（見同上）現在要問：這種「樂觀主義」是靠得住的嗎？胡適的這種「樂觀」，就是連他治下的北大教授都未見得同意，例如北大教授楊人楩說：「國民黨方面可能有人在想：不妨再打八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時，再把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一同來解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會發生？何時發生？發生以後，美蘇是否一定會敵對？孰勝孰敗？戰爭結束時與中國問題關係若何？對於整個中國國民的利害若何？對於這一連串的問題，任何有遠見的人都不敢給以肯定的答案。答案既然不肯定，硬要等世界大戰來解決中國問題，等於是

賭博；政治家應當根據現實來判斷，賭徒才肯以徼倖心理去碰運氣，有賭德的賭徒是拿自己的資本去下注；拿全國人民的福利來做賭本，在賭徒也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罪行。」（楊文「內戰論」，觀察四卷四期）如果照楊氏所說，那末，胡適當然也是「賭徒」之一了，然而今天夢想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解決中國問題的，實繁有徒，豈止胡適而已哉！

（六）依靠美援

「苦撐待變」未嘗不是行險徼倖者的一條路（？），然而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不可捉摸，這就是「時間因素」。有的人估計，第三次世界大戰至少要待五年以後才能爆發；有的人則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簡直為不可能，因為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民主力量很大。我們就假定第三次大戰在五年以後吧，但中國當前的局勢，能夠允許苦撐過五年嗎？一方面想撐下去，另一方面不讓你撐，怎麼辦？於是便有人提出，「唯一的辦法，就是將自己的命掛在華盛頓。」（觀察）這就是說，向美國求救，依靠美援，

由美援來幫助中國苦撐，說不定不但可以撐過去，而且中國問題或許能提早由美援協助解決，目前的「翁內閣」不是又在說，希望「能在兩年以內，結束軍事」嗎？所謂「美援」，過去的不算（過去美國官方曾承認對華援助共計二十九億零五百八十萬元，而實際據查估，至少當在八十億元左右），就是最近經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的「一九四八年援華法案」中決定給予中國的四億六千三百萬元。這次美援，據說，小部份是軍事援助，大部份是經濟援助，其實不管經濟援助也好，或軍事援助也好，總之，目的都在支撥中國內戰的一方。不過根據以往美援的經驗，美國過去花了那麼多的錢來援助，尙無效果，而區區四億多美元，豈能創造奇蹟！據有人估計：「自從全面內戰開始以來，至今共計二十二個月，這二十二個月中，爲了內戰，政府方面已經用美國的「援助」八十億元（或一百億元）。又孔祥熙院長移交下來的九億美元與六百萬盎司黃金（約合市價四億美元），再加上敵偽遺留下來的十億美元資產。同時，在這一時期內，法幣通貨膨脹已由七千億元增加到目下的最少估計二百萬億元，加以折衷匯率計算，約值美金十五億

元。合計二十二個月共用去戰費及間接戰費一百十八億（或一百三十八億）美元，平均每個月須用六億美元左右，每天須用二千萬美元左右。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不過等於中國二十三天的戰費而已！」（見梅碧華著：「中美之間」一書，新知版）何況這筆美援還要分爲十二個月才付清呢？由此可見，要依靠所謂「美援」來解決中國問題，是絕不可能的。也許有人說，美援在將來是可以加多的；然而，有一個從瀋陽到青島的美國商人對聯合記者却說：「無論美國援助中國五億七千萬或五千七百億元，其結果同。」（三月廿八日）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出「美援」的不足恃了，爲什麼呢？這因爲正如美國一位傑出的軍事評論家威爾納（Max Werner）所說的：「決定中國內戰今後局勢的，乃是人力、物力、組織能力、士氣、政治，這些因素，都不是外國援助所能代替的。」（一月十日美國下午報）

上面我們僅就「美援」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而言，至於中國政府因接受「美援」而喪失了許多國家主權（如簽訂不平等的中美商約，允許美國在中國建立海空基地，斷送海

權空權，以及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都由美國派遣顧問指導監督等等）使中國復淪為美帝的殖民地（表面上是「獨立」的），這更增加了解決中國今後出路問題的困難。

（七）革新運動

最後，還有一張救中國的王牌，就是來一個「革新運動」，因為「同意革命」事實上辦不到，和既不能，非戰不可，「苦撐」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變」，有點渺茫，美援又無濟於事，那末，還是由自己來設法吧，這設法之道，就是「自力更生」、「改革內部」的所謂革新運動。講到這一「革新運動」，却是名目繁多，內容紛雜，有的說，要有一個「新革命運動」，有的說，要實行「自我革命」，有的宣稱，應「讓中間派來領導革命，實行新政。」有的則謂這是「不流血的革命」，有的說，這是中國的一條「新路」，應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和「知識份子」來領導，才有辦法。說法儘管各有不同，而其目的却是一樣的，這就是要怎樣來挽救如前面所說的現政府的危機，而

照主張「革新運動」者所說，是爲了挽救當前「中國的危機」。現在就不妨看看，他們能否挽救這一個「危機」？

(1) 從「新革命運動」談起

談革新運動最早的，是所謂「新革命運動」，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司徒大使在北平燕大對聯大學生說：「我希望中國能有一個新的革命運動產生，把舊有的國民革命精神恢復起來，以熱血與愛國革命來改革中國。」不久，在十月廿六日上海大公報上就登出有羅夢冊等十二人起來響應，提出「讓我們來促成一個新的革命運動」，據他們自己說：他們都是一些從事大學教育、中學教育、新聞界、工程界工作，與服務公務機關的人們。他們認爲這運動的「第一步的開道工作，即首需有一個超黨派、超宗派、破巖穴、毀偶像、反封建、反官僚、反貪污、反腐敗之發聾振聵，蕩腥滌污的大革命的爆發的展開。」接着就有劉韻等一些青年表示擁護羅夢冊等這個「新革命運動」，看起來這

好像是從羣衆中發出來的一種「革命要求」；但很快就明白過來，這一運動是與政府有關的。『首先，我們看看……簽名者，是否真如他們自己所說是「超黨派、超宗派、破巖穴、毀偶像、反封建、反貪污、反腐敗」的人。在羅夢冊等十二人的文章的結尾裏，曾遮遮掩掩的這樣寫着：「……讓我們來聯袂而起，登高同呼，偕手並進，來催促此一自救救人的新革命運動之誕生與展開，以響應司徒大使之呼籲，蔣主席的號召。」已經露出這運動是與當局有關的；而在劉韻等十五人的文章裏，則更找尋到這批「超黨派」青年的黨派性。……這羣青年說：「三民主義青年團、二中全會（國民黨的）宣言，對於官吏貪污昏庸情形及當前局勢，敘述得可以說慷慨激昂，淋漓盡致。」這感覺豈是「超黨派」的人所能體會出來？接着這些「超黨派」的青年就高呼起來：「愛國家愛民族的志士們，擁護蔣主席的同志們，我們聯袂起來，團結一致，自救救人，迅速展開這偉大的新革命運動，以響應司徒大使的號召，蔣主席的號召。」這很清楚的把那些「超黨派」青年的黨派性顯露了出來。原來發動所謂「新革命運動」的，就是這些高喊「擁護」

的「同志們」那些「超黨派、超宗派、破巖穴、毀偶像、反封建、反貪污」的好字眼，原只是個幌子，想用這些幌子掩蓋這些「新革命」者的黨派面貌，以便潛入青年羣衆發動一個「新革命」運動。『其目的，是想把正在苦悶中的青年，騙到內戰中來，組成一支新十字軍，幫助屠殺自己的同胞，實行萬世一系的獨裁政治。』（見上海新文化半月刊二卷十期）正因為這個運動是與政府有關的，所以國民黨內部不久便有了所謂「革新派」的革新運動，而羅夢冊等這一批人則在辦「主流」雜誌，以鼓吹其「新革命運動」；然而，這一運動並沒有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效果自然就更談不上了。

（2）由「新革命運動」到「自由主義運動」

「新革命運動」的炮沒有放響，於是便有所謂「自由主義運動」產生。

什麼叫做「自由主義運動」呢？就是今天中國的問題，只有由自由主義者和智識份子起來，才有解決的可能，例如內戰須由自由主義者起來制止，政治須由知識份子參加

改革，只有自由主義和智識份子才能領導中國實行一個「不流血的革命」運動，如果這一運動成功了，那末，中國才有出路，中國才有救了，等等。鼓吹這一運動的有上海大公報、觀察周刊和一些官方報紙雜誌。見之於大公報的有「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社論）、「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社論）等文，這算是開台戲，把「自由主義」的鑼鼓先敲響了，接着便有許多關於同意大公報主張的文章在該報上發表出來；見於「觀察」雜誌的則主要有下列各文：「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與對策」（楊光時等十人）、「論革命」（周鍾岐）、「重演歷史、創造歷史」（孫克寬）、「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楊人梗）、「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李孝友）、「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施復亮）。

33

周鍾岐在「論革命」一文內講得很清楚，他說：「現在留下的祇有一條可走的路，讓中間派來領導革命，實行新政。中間派是什麼？它就是智識階級和自由主義的溫和份子；他們有理智，有信仰，有專長；他們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

們能夠推行緩進的社會主義，領導革命，組織一個多黨的聯合政府，只需三十年的時間，這般人必能安定中國，完成革命的最後一步。在過去的世界四大革命中，這班人的確能領導羣衆，促成革命。現在中國也是如此，要靠知識階級的努力。」（觀察）但是，要怎樣的知識階級才能擔負這個任務呢？「這並不是改頭換面的策士之流的結合所能任事，必須以有骨氣、有理性、有接受一切磨難決心的知識份子（本質是接近人民的，無成見的），結合真正利害關係的階層——鄉村的中農以下的人民，都市的平民階級中的優秀而有領導力、組織力的份子，站起來，要求改革，主張應得的權益（如市民的自治權，各地方的建設與自治事業），匯衆流爲江河，以和平合法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的。」（同上）前面所提到的羅夢卅亦有類似意見，他說：「幾千年來，握中國政權的智識份子，是士大夫階級，而我們現在需要的智識份子必須是受過大難的磨練，經過了質變的無產者，那就是我們的「勞文」，我相信這種新的力量，很快就會產生，而這種新的力量什麼時候產生，現在的局立刻可以改變。」（一九四八年三月廿八日上海大

公報）而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張金鑑則說：「現在中國的局勢，已經鬧到這般田地，現在的爲政者，要他們放下屠刀吧，不肯；向他們痛哭流涕，懇切陳詞吧，無用；要來一個政變吧，又不一定行。現在的辦法只有全國的智識份子聯合起來，領導做一種自覺、自立、自救的社會運動。我們要造成一種風氣，使社會向着這個方向走去。這成效不一定在今天，但到相當時期以後，就會發出一種力量。那時候社會要變，政府也不得不變了。」（同上）

（3）新的「第三條道路」

如果說，前面是所謂「自由主義運動」的宣傳時期，那末，第二階段便是「自由主義運動」的組織時期了。以自由主義份子、知識份子和大學教授相號召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於三月一日（一九四八年）在北平宣布成立，開成立會時，「周炳琳提議推錢昌照爲臨時主席，全場四十餘教授一致贊成，錢氏致詞：我們研究的目的，是爲全民

福利，我們研究的方法儘量客觀，我們研究的方式絕對公開，我們真想尋求一條新路，既不拘於國內已經有人走過的途徑，也絕不隨着國際局勢的演變而輕易轉移，他們必須集中力量並與外界合作，根據全民需要，試畫一幅建設新中國的藍圖。社會局代表熊正修致詞後，討論簡章，選舉周炳琳、錢昌照、吳景超、孫越琦、蕭乾、潘光旦、劉大中、錢端升、陶孟和、王崇植、樓邦彥爲理事，邵力子、吳蘊初、童冠賢等爲監事。（見三月二日上海大公報）這就是盛傳一時的所謂「新第三方面」的組織。據香港華僑日報上說：「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開辦費，一次就是二百五十億。」（三月七日上海專訊）這筆款子是資源委員會撥的，然而錢昌照對外却說：「該會會費爲每人十萬元，全部五十九人，也不過五百九十萬元法幣。」這自然是叫誰也不會相信，單看下面參加者的成份，就可見這所稱「新第三方面」是什麼？

在參加者五十九人中，計開：

一、國民黨黨員三十名：丁忱、王崇植、石志仁、朱光潛、朱忠道、江季平、谷春

帆、沈家禎、吳半農、吳景超、邵力子、周炳琳、姚念慶、段錫朋、孫拯、孫多鈺、孫越琦、徐淑希、高植、陳源、陶孟和、張文潛、張祖良、童冠賢、葉景莘、盧作孚、盧郁文、錢昌照、錢端升、霍寶樹。

二、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二人：段錫朋（執委）、邵力子（監委）。

三、前三青團中央幹事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一名：朱光潛。

四、國民黨現任及前任新舊官僚二十三名（包括孔系、宋系、政學系、CC系、朱家驊派）：丁忱、王崇植、石志仁、朱忠道、江季平、谷春帆、吳半農、吳景超、邵力子、姚念慶、段錫朋、孫拯、孫多鈺、孫越琦、徐淑希、陳源、張文潛、張祖良、童冠賢、葉景莘、盧作孚、盧郁文、霍寶樹。

五、國民黨經濟、政治理論專家七名：王鉄崖、谷春帆、趙人儻、吳之椿、趙迺搏、吳景超、劉大中（CC）。

該「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實際負責人爲錢昌照、吳景超、蕭乾。錢昌照統籌全

局，吳景超主持「研究」工作，蕭乾主編「新路」雜誌。該會還通過了政治主張三十三條，說明他們「對於中國前途的看法」，內容包括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政策四部分，其實都是別人唱過的老調，並無任何「新」的東西。

*

*

*

*

同時，南京也有一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創辦了一個名叫「中國論壇」的刊物，在它的代創刊詞「鋪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一文中，更明白的寫出如下的一些話：

「今天的局勢，中國已面臨到生死存亡的分水嶺，我們固無愛於現政府，但如果現政府一旦崩潰，中國的混亂與犧牲，將較此時更嚴重千百萬倍。

「我們認為在當前危險萬分，史未前有的情勢下，實行改革，挽救中國，除了在蔣主席領導之下，絕少甚至毫無成功的可能。

「因此，我們主張在「要變不要亂」的原則下，自由份子應組織起來，以鮮明的正確的主張和行動來填平國共兩方的罅隙，如屬可能的話，他們應當毫不躊躇的担負起最

繁鉅最艱苦的任务。

「所以就目前情形說來，自由主義者應該團結，應該聯合，已不但是必需，而且是可能，還有呢？即是刻不容緩，這是本刊同人所寄與當前國內自由份子的最大希望。

「在新的革命運動旗幟下，我們認定「中國不變必亡，中國再亂亦必亡」。我們尤深信「一個變而不亂的不流血之革命，乃是中國唯一的出路」的至理」。

*

*

*

*

除此之外，還有一批大學教授，發表宣言，組織團體，要求現政府作具體改革。先是有南京四十七教授發表：「爲時局告國人書」，列舉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及對外等主張稱：「當前國家已面臨極嚴重之危機，全國人民正遭遇最陰沉之恐怖，吾人精神上所感苦悶之深刻，及生活上所受壓迫之沉重，實已遠超抗日時期任何階段，際此舉國惶悲，民不聊生之時，吾人已忍無可忍，不能再事緘默，願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旨，與國人共同研討造成此現象之因素，及其解決之途徑。」因此，「吾人爲全國人民

之繼續生存計，不得不向國內外「大公無私之公民」及「忠於自由之全國知識份子」，大聲呼籲，迅速團結，採取有效行動，促使雙方覺悟，重建一合乎時代潮流，合乎人民需要之真正民主自由政府；萬一不能出此，則惟有退而切望現政府認清時代潮流，澈底改革，推行民主政治，保障言論思想之自由，厲行經濟教育之機會均等，以打破目前之僵局。吾人主張現政府之重要負責人員應即時反躬自問，痛自內疚，以責人者責諸己，針對一切積弊，作迅速之改革。」接着，便有南京大學教授一百人發表「對時局宣言」，提出挽救當前局勢的切要主張，其主要內容為：「確定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爲一切政策之基本原則。政治：開放言論，尊重輿論，分層負責，以奠定民主之基礎。經濟：清算豪門資本，重新分配財富，以達到平等之目的。」此外尚有上海、北平、廣州等地教授亦曾向當局作類似的改革呼籲，而南京各大學教授並有進一步籌組「國是策進會」的行動。而當南京「行憲國大」開過，正副總統選出之後，南京又有四十九教授發表「對新政府的意見」，要求「新政府」澈底調整人事，擴大基礎，並迅速推行「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政策等等。

總之，這一切都說明了現狀已很難照舊的維持下去了，統治內部一部分不滿現狀和看到這種危機的人，已紛紛起來要求自動改革，希圖藉以避免廣大人民的革命，他們把最後一切的希望與「中國出路」都寄托在這種改革或改良之上。

(4) 這條「新路」行得通麼？

現在，我們要問：這條改良的「新路」行得通麼？有的人從理論上對這條路甚為懷疑，而有的人則根本的與以否定。懷疑的人說：「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務，這不是不可能，英國的工黨執政以後，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來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似乎已經收到了相當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國來，是否也能收同樣的效果？何況中國兩個武力集團的對立，怎樣使他們放下武力，和衷共濟的改造社會？由近來局勢的發

展，除非上帝給我們好好的安排。」（陳旭麓：「我們向那條路走？」觀察二卷二十一期）北大教授樊弘氏却認為這不過是一種空想，他在駁蕭公權的一文中說：「蕭先生在他的著作裏面一再提及英國「在工黨執政下，正努力循着共產革命以外的途徑去改造社會，」意思好像是說，中國的國民黨、青年黨、和民社黨也正在努力循着共產革命以外的途徑去改造中國社會。但中國的國民黨是英國的工黨麼？中國的國民黨，在本質上，不但不如英國的工黨，而且復遠不如英國的保守黨。例如政府曾濫權逮捕北京大學的學生鄧特，……施以嚴刑拷打，這都是英國的保守黨所不願做的。但國民黨則正在肆行無忌。不知蕭先生肯承認這話麼？英國的保守黨比中國的現存的諸合法政黨還進步，但還不能努力循着共產革命以外的途徑去改造社會……。但中國的合法諸政黨，其本質尚遠不如英國的保守黨，而蕭先生却暗示着他們正在努力循着共產革命以外的途徑去改造中國社會。這還不是不智的、空想的和無效的麼？」「自由的社會主義能夠在美國特權階級和在中國的特權階級手裏完成麼？」（樊弘：「評蕭公權先生的「二十世紀的歷史

任務」，時與文三卷七期）

以土地改革爲例，有人說：「誰最能徹底實行土地改革，便是誰最能獲得廣大農民的同情和擁護，而因之獲得在農村中的戰鬥勝利。」「土地改革實在是彼此競爭的目標，內戰的雙方勝敗實繫於此。廣大農民的利益，無疑地必由農民羣來作取捨的選擇。」（施若霖：「論中國土地改革」，觀察二卷二十一期）但是，政府當局對這一問題的 policy 是怎樣呢？雖然「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也已被人喊了二十多年，我們今天舉目環顧全國各地農村裏的實際情形，可說依然還是一仍舊貫，甚至反較以前還要來得嚴重尖銳萬分。這事實足以證明，中山先生這一作爲民生主義骨幹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遺教，雖然一直爲人奉爲臬主，可是真正付諸實行的依然百不得一。」「國民黨執政的二十年中，改革土地主要政策，據現任地政部長湯惠蓀氏說：是用「地價累進稅與土地增值稅來達到平均地權的目的。」而「要徵收土地稅，必須先辦地價估定；要估定地價，又必須先辦土地陳報與土地測量。」所以現在地政部的工作，就正在繼續

進行土地測量，而且已經進行了二十年。可是「中國的面積太大了，土地測量實在是一個鉅大的工作。據估計全國農田約有二十萬萬畝，而進行了二十年的土地測量，現在尙只測量到一萬萬畝。」（見中央週刊十卷十一期）測量了二十年工夫，還只測得一萬萬畝，不過僅佔全國農田總面積的二十分之一，如果照這樣的工作效率，要完成此工作，開始正式實行土地改革，豈非還要等到三百八十年以後？」（姜慶湘：「當前的土地改革問題」，改造評論，二卷二期），不錯，「在此千鈞一髮時期，國民黨的進步份子已在呼喊着「實行土地改革之時機業已來臨了。」（觀察）因此，華北的傅作義表示要「實施土地改革運動」，現在擬方案中，國民黨中宣部長李惟果說：「國民黨要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另一方面將士也要授田，才能鼓勵他們的士氣。」（上海大公報四月九日）國防部發表華中剿匪新措施，規定「爲着保護農民扶持民生，土地問題要提前解決，要由實行平均土地使用權到平均地權，真正實行耕者有其田。」（上海新聞報三月二十四日）與官方有關的中國土地改革協會亦擬好了一個「土地改革方案」。然而，國

民黨是否即能「實行土地改革」呢？南京食貨學會負責人曾資生指出「應注意政府的本質問題」，這就是說，以一個代表地主利益本質的政府，就無法「實行土改」。南京地政學會負責人萬國鼎說：「政府施政要經過立法程序，要通過行政機構，各級民意機構的代表們大多與地主階級有瓜葛，各級行政機構的主管人員也往往是地主階級，對於推行土地政策常常發生意外挫折。」（中央周刊十卷十一期）這就說明了土改能否實行，與政府本質大有關係，所以曾資生氏也說：「我們黨和政府的土地政策，一到鄉村中去，就被少數人操縱，不顧農民的利益，甚至成了妨害農民利益的東西。……若干黨人只知道升官發財，發了財便兼併土地，變成新興的地主階級。」（同上十卷十二期）學原社社長徐佛觀氏更率直的指出：「今日的某院是最反動的，以這批封建落後的地主集團來主持大計，自然談不到土地改革。」因之，「把土地問題的解決，寄托於他們的身上，寧非緣木求魚？」（同上）而因此，「我們很中立而無庸諱言地說，中共在逐步的土地改革上，是相當堅強了他們底經濟和軍事基礎的，在激烈的內戰砲火下，中共能夠

與國民黨分庭相抗，未嘗不是農村人民之力。他們爲了最後勝利，實踐了土地改革。國民黨則爲了他們一部份地主階級利益的立場，對於土地改革，總是因循姑息，遲遲其行。」（施若霖：「論中國土地改革」，觀察二卷二十一期）

在許多謀臣策士（包括大學教授、自由主義者、知識份子等）的改革主張中，土地改革是列爲改良的極重要的一部分，今現政府對於土改的前途是這樣，那末，我們也就可見其餘的改良了，例如曾有許多人提出「要徵用豪門資本」，這又牽涉到政府的本質問題，即以一本質上代表豪門利益的政府，怎麼又能期望它去損害豪門的利益呢？所以就難怪有人說：「中國今天的土地問題，確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一個有關整個社會制度的改革問題。」（改造評論二卷二期）這是很正確的。

（5）「新路」的最後期望和幻滅

從理論上說，這條改良的「新路」，難以行得通，既如上述，於是有人便把「最後

期望」寄托於即將召開的「行憲國大」，以及由這「行憲國大」而產生的「新總統」和「新政府」的身上了，他們認爲這是現政府的一個最好的政治改革機會，而且，從此可以「一新天下耳目」，這對於前方和後方未嘗不可以起「新陳代謝」的打氣作用的。因此：他們把「新路」的第一個期望寄托於首屆的「行憲國大」。

然而，「行憲國大」是開過了，大家對於這次「行憲國大」召開的印象怎樣，我們不妨引用「改造評論」主編方秋葦的「國民大會的觀感」來做參考，以見一斑。他說：

「這次國民大會的舉行，是民國史上一件大事；無情的歷史家，必將用其冷酷的筆，寫出它的黑暗，寫出它的醜惡，寫出它的污穢，讓後世的人去評判它的是非，去分析它的陰陽怪氣。」

「我們對於國大的召開，從未予以重視，每天僅以看熱鬧的心理，閱讀報紙的記載。我們和許多人一樣，看到國大這個熱鬧非凡的場面，吵吵嚷嚷，連噓帶罵，傳單飛舞，毫無秩序；在會場外邊，抬棺拚命，絕食抗爭，吹吹打打，圍攻報館。」

我們不禁歎氣，爲民主政治的前途悲，甚至爲國民道德水準底淪落而沮喪。尤其是副總統選舉的一幕，觸目多增悲憤，人們的反應由冷淡而爲惡劣，甚至許多出席國大的人，也感到切齒傷心。儘管副總統是「順利選出」了，可是，人們的冷淡，挽回不了；人們的悲憤，填平不了。

『如果有人問：這次國大是成功抑是失敗？我們的回答，是失敗了。』

『如果有人問：這次國大失敗的責任應由誰負？我們的回答，是由國民黨負。』

『這次的國大，不是舉國一致的國大，乃先天的失敗。國大召開以後，會場秩序之惡劣，國代之良莠不齊，國代對於憲法規定之忽視，與夫提名競選方式之奇特，注定國大是完全失敗了。』「國民代表」本是這部憲法派生出來的，如果當時制憲尊重政協原來「無形國大」的用意，不設有形的「國民大會」，勞民傷財選出三千代表，那有今天的失敗？那有今天騰笑萬邦的醜態。」（改造評論二卷二期）

就是接近官方的大公報，對於「國大觀感」亦不佳，該報在其上海版五月二日的社

論上說：「國大開會期中，無論是在會場裏，在報紙上，或是在街談巷議中，都熱鬧極了，真可謂「極一時之盛」。但會既開過，在人民的觀感上是個空虛；揣想起來，就連躬與其盛的兩千多位代表，在回味中，或也不免有空虛之感。」「大會一開頭，就是抬棺材示威，絕食抗議。這些「簽署代表」的鬧，並非無理取鬧。他們依照程序，獲得代表的資格，爲什麼叫他們讓呢？這一開頭，就看出黨的措置欠週。說是以黨讓黨，以人讓人，也覺得頗爲勉強。而在這鬧的過程中，絕食自絕食，開會自開會，這無論是估量絕食者不會真個餓死，或是「不去管他」，都不免有輕視人命之感。會快完了，當選證書發給了，傳說一位絕食代表跳江自盡了。江流石不轉，遺恨欲何如。」

* * *

「國大」召開的結果既如此，因此：

他們把「新路」的第二個期望，寄托在「行憲」上。

憲法不是萬能，早已有人說過了，因爲「凡是稍具清醒政治頭腦的健全公民，沒有

不知道一部憲法法典決不是一服治百病的萬靈藥。在世界憲典史上，雖不乏憲典促成憲政之例，然而也有多少國家，憲典儘管制定，而上軌道的政治始終是不能變成事實的幻影，我們的三十餘年來的制憲史更是最現成又最近的實例。政府中的大部份人士應該也獲得足夠的歷史教訓，那就是中國的問題絕不能單靠白紙上的黑字就能解決，是則他們顯然是別有用心，他們不僅沒有能瞞得住他們自己良心，他們的所作所爲也絕不能粉飾得了太平。」（樓邦彥：「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觀察，四卷五期）何況「憲法已經戳了一個洞」（大公報），這個「洞」就是授予總統緊急處分權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因而「這部一百七十五條的新憲法，它的「神聖」，它的「尊嚴」，已經被國民大會摧毀了。而「國代自鳴得意是成功，實則是澈頭澈底的失敗。必然地，這將成爲不可補償的失敗。」（方秋葦：「國民大會的觀感」，改造評論）

* * *

其實，「國大」開得失敗了，「行憲」豈有單獨成功之理。因此：

他們把「新路」的第三個期望，又寄托在選李宗仁爲副總統的上面。

爲什麼要將「期望」放在李宗仁的身上呢？據大公報說『李宗仁常選後，國大代表那樣狂歡，南京與上海的街頭也爆竹連天，這象徵什麼？乃象徵「人心思變」。是象徵不滿一切中央支配，也象徵歡迎地方人物入中央，以爲均衡。』再看看美國報紙對李宗仁「被選」爲副總統後的論調就更清楚了。紐約先驅論壇報說：「在言論方面主張改革最力之人物現已擢居高位。李氏在國民大會之勝利證明其有政治上之後盾，且在成功之將領間友好衆多，辦事庶免掣肘。若能保持改革之熱心，必可完成大業。」（四月三十日社論）克利夫蘭（俄亥俄）正言報說：『李宗仁將軍知道忠實的政府所能做的事情。他知道在反抗共產黨方面獲勝的唯一希望，乃是儘可能提供最好的政府。李宗仁將軍希望獲悉各方面的意見。這在向來是百分之一百以國民黨故步自封的政府各界中，是一種新的傾向。他堅持實行基本的軍事、經濟、政治改革，這種行動，蔣氏曾避免採取。李宗仁將軍並不是蔣氏「唯命是聽的人」，他對中國有見解，也是二十年來自統治政黨內

部最好的見解。蔣氏現在有了一個有能力的助手，以及一個極積極與足以激發他人的良心的人。」很明顯的，美國及統治內部都希望李宗仁做了副總統以後，能夠領導改革，有所作為。

但是，李宗仁是否有所作為呢？有人說，李宗仁在競選前的「政見」，不過是「一張不知能否兌現的支票，是對未來一段時間（也許就沒有這段時間）的假想和投機。」因此，歸附李宗仁先生的物望，在他當選副總統以後，仍是行雲縹渺，不着實際。」曾審思：「賀李宗仁」，時與文三卷四期）而且「什麼是李宗仁的政見呢？照例，在台下的李宗仁先生與在台上的李副總統，是不同的。副總統拿到了手，李氏夫婦一齊說：「我競選勝利，就是戡亂的勝利，蔣總統的勝利。」……從這點看，我們對李氏標揭的政見，不能不打一個折扣，最好以競選宣傳視之。」至於「美國對李宗仁的當選，稱譽為「革新派之勝利」，並以李氏改革廣西為例，殷切期望。如以廣西所實行的「三自政策」為標本，則李先生所領導的革新內容，已告陳舊。廣西一隅，閉關自守，尚可勵精

圖治。而今李副總統無權無力，對全國局面，怎樣可以言成可以行革新呢？我想只有假借外力一個方法，或尙可以耍幾手。只有信賴和憧憬着外力萬能的人，甘投李字旗下。是的，今後革新運動的大小團體，可能將以美國爲背景，慢慢地統一團結在李宗仁的周圍。但在「動員戡亂」（國大宣言）國策至上的條件下面，任何革新都無法有效施行，這是很明白的事。」（見同上）

*

*

*

*

我們根據前面所說，可見就是李宗仁做了副總統以後，也未見得能「有所作爲」。那末，因此：

他們把「新路」的最後的唯一希望，就只好寄托在「行憲」後的新政府了。

53
這個「新政府」是不是能像一般人所期望的呢？我們只要舉出兩位「立委」的談話，就可以知道，立委張潛華說：「我們最初投翁院長一票，是有所期待的。這些天看內閣名單，今天聽施政報告，我們的期待消失無餘。新閣實無獨立的政治性格，有些人不

僅是三朝元老，而且是四朝元老。這些人能幹些什麼？又弄成這個樣子，在政治觀點上使我們失望。」（上海大公報，六月十二日）而「立委」劉不同則說：「當國人要求行憲後的政府要變，以變來應變，我就恐懼到這種要求，其結論恐怕是一個失望的答復。據我的研究：今天執政的政團，已失却了政黨的本質，而走上了歷史中所謂王朝之路，以政府爲保障統治集團各組成份子的利益之武器，以政權爲剝削人民而滿足私欲的鞭子，不以政府爲民族延續生命，爲人民謀福利的工具。因其成爲了王朝，其主義，其政綱，都會因本身的利益而背棄，成了欺騙人民的口號，甚或藉爲掠奪的方法。因其成爲了自私集團的王朝，他們決不會輕易地放下了鞭子，而把管理衆人之事的政權轉移給自由進步的人士。翁氏內閣全部閣員，中國人民過去都給予他們機會以伸其所懷，其中有執政二十年，最少也有五六年，可是他們給我們的是苦難，不是福利，他們表現的是自私欺騙，不守法。他們的精神與物質欲望總算滿足了些，可是我們陷於苦難。他們的什麼施政方針，施政綱領，不過是一些中國官場上的文章。所以我對翁氏內閣實不敢抱

什麼奢望。」（上海大公報六月七日）

所謂翁內閣，就是以翁文灝爲行政院長而組成的行政院，上海大公報評這個「新行政院」道：「讀總統命令，由副院長顧孟餘到正副祕書長李惟果梁穎文，一共二十五位長官，生面孔沒有幾張，而內政、外交、教育、司法、農林、工商、交通、社會、水利、衛生十部，概由舊任部長蟬聯。一般人所期待的「變」與「新」，或許並沒有得到鑿足吧。其實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個局面到了一種定型，一個性格到了一種程度，縱使要變也變不了許多，滿心想新也新不了多少。尤其一個人，由成功到保守期，就會厭倦開創，懶於革新，甚至連生面孔也不願見了。」（社評，六月二日）

*

*

*

*

從以上種種反映實難掩飾一般人對所謂政治改革的「新路」的最後的失望和幻滅！這是一羣要求改革者的悲哀，而同時也正是統治內部的悲哀！

(6) 「新路」爲什麼會走不通呢？

這喧傳已久的一條改革的「新路」爲什麼會走不通呢？除了如前面「立委」劉不同所指出的由於現政府已成了「以政府爲保障統治集團各組成份子的利益之武器，以政權爲剝削人民而滿足私欲的鞭子」這一個重要原因而外，而最主要失敗的原因，是因爲這條所謂「新路」，並不是廣大人民所要走的道路，相反的，它乃完全是在美國陰謀策動下的一條反人民的道路，這就是說，舉凡過去所謂「新革命運動」、「自由主義運動」、「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以及什麼改革要求等等，其實都是與美國有關，這是它的對華政策一部分，目的在於欺騙中國人民，以便在此種欺騙之下，達到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變中國爲殖民地的野心。『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一貫的，但其表現是兩面的：一面是幫助政府進行內戰，一面是耍手段欺騙中國人民，而後者是作爲前者的一種掩護或者是作爲緩和和政府軍政危機的一種手段。不久之前的「和談陰謀，正是這種「欺騙政策」的

繼續發展，所謂「自由主義運動」也就是這種「陰謀」的一部份，這是由美國國務院「設計」，司徒雷登、魏德邁等「導演」，宋子文、邵力子、錢昌照等「幫助導演」的，而演員則是從胡適到大公報的一般大大小小的「自由主義者」。（上海國訊周刊四五六期「香港通訊」）至於美國是在怎樣導演這一次的「自由主義運動」和改革運動的，據同上一期的國訊周刊上說：「一九四六年雙十節司徒雷登的一篇號召自由主義者起來在「蔣主席領導下」進行一種「革命」的演講，這是美國對「自由主義運動」的第一次倡導，馬歇爾離華的聲明也是要求「自由主義者在蔣主席領導下團結起來」，這是第二次；一九四七年魏德邁來華，特地到北平去找尋一些「自由主義」的教授名流談話，這是第三次；不久以前司徒雷登的「告中國人民書」又提出同樣的說法，這是第四次。」『第一次司徒雷登雙十演講以後，就有一羣文人發表什麼十人書來響應，大公報的副刊「時代青年」也展開討論；魏德邁來華前後，「觀察」雜誌上有人大談其「自由份子結合運動」，又有人提出「民主國際」的計劃，要美國對中國自由主義者作經濟上

的援助；而這一次當政府處境危急，美國進一步策劃「和平」的時候，上海大公報又發表了「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胡適也公開的發出反蘇的論調。同時，以邵力子等為主幹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也在北平成立了，還有國民黨吳某出錢，雷海宗主編，在北平創辦刊物「週論」，以及由錢昌照出錢，蕭乾主編，創辦刊物「新路」，同以高稿費向北方各校「自由主義」教授拉稿。在上海，潘某等也力促「自由主義者的團結。」

如果，我們再證之以美國官方和美國報紙的言論，那末，對於係由美國所策動的「革新運動」，就更毫無疑問了。美總統杜魯門說：「中國自由主義人士甚多，一部分且曾在美國留學，他們構成所謂中國知識份子，此即美國認為中國擴大政府基礎應予羅致者。」上海英文大美晚報則更明白的招供說：「在過去數月中，由於美國非官方與官方鼓勵的結果，大批所謂自由份子團體，已經開始工作了，以便取得他們所認為正在來臨的政治果實之全部或一部。……」「時下自由份子政治團體中最為人知的便是最近在北平成立的社會經濟研究會。這個團體是由許多北平教授支持，並由資源委員會錢昌

照照顧的。……」……但它缺少有力的領袖。胡適博士據說曾被邀參加的，但他善意地辭謝了，可是答應在背後給這團體以道義的支持。……」……一個南京的團體是由四十七個教授組織的，另一個是由一百教授組成的。兩者都發表了冗長而基本相同的宣言。在上海，至少有三個團體正在自由主義的光明嶄新的旗幟下進行。最近一個團體是由幾個雜誌發行人組織起來的。……」（四月二十六日社論「中國的自由主義」）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則說：「知識份子、無黨派者、自由份子以及新聞記者等，應起而保衛中國人民之權利與義務。……如中國前進份子堅持民主改革，則在此緊急時期之美援不僅可予以技術與物質上之協助，且可鼓起新希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北平發表的談話）這還不夠明白嗎？所謂「革新運動」，原來是爲了要配合「美援」的。

所以「這些既然都是事實，並不是什麼憑空的臆測，那末，李宗仁將軍的當選，顯然是包括在美援之內的。同時，李將軍當選以後的改革呢？不也正是和美援計劃相配合

的嗎？也就是憑了美國的經濟援助，特別是軍事援助，來貫徹戡亂了。」（歐陽重光：「李宗仁當選以後」，創世，十六期）

因此，「我們就不妨來對證一下事實，研究研究這改革的出路在那裏？如果我們不是遺傳性的近視，那末，面對着當前活生生的現實，以及中國人民所親身體驗到的艱辛，就不能不承認：循着杜魯門、馬歇爾、魏德邁、司徒雷登，乃至麥克阿瑟和蒲立德等的計劃來改革中國，不僅是緣木求魚，並還是引狼入室：

「首先，所謂「戡亂」便是戰爭的繼續，即使有和平運動出現，也不過是掩護戰爭進行的一種手法，在積極意義上，是攻心——心理作戰；在消極意義上，是緩兵之計。然則所謂收拾人心的改革又是什麼呢？……」

「自然是輪到了七分政治的改革。這在美國號召和一部份中國知識份子如響斯應的情形下，可能是要為「行憲」裝點門面。但是，這些知識份子們既擺不脫歷史對他們的公正裁判：一向是崇尚「學優則仕」的依附權貴，伴食王侯；今更習於充當帝國主義的買辦、豪門和官衙的奴才；無論是古之所謂

士大夫或今之所謂代議士，總跳不出「君王聖明」和「黎民黔首」，這一類的歌頌者和幫忙幫閒的奴才市僧。因此，這一類型的知識份子，往往在一代王朝衰政，總是以濟危扶傾出來倡言改革，勸君施惠以平民反，深恐魚肉人民的事業敗壞。故恆以標榜中間，作改良的欺騙。這只要粗知歷史，把自己站在人民痛苦方面，來正視當前的現實，就不會受這些知識份子的欺騙。」

而且「凡是裝點衙門，新設機關，擺幾個新人，印幾張弔民伐罪的沉痛宣言，更多些光面堂皇的法令手諭，以及更多的報紙和雜誌宣傳，乃至再照抄馬歇爾計劃來一套社會賢達和政團黨派的什麼國是會議，也只能是欺騙。那怕就不走樣地搬來了美國式的民主，這也不是真正的、中山先生遺留給中國人民的，包括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爲什麼？因爲「依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任何改革，既是對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背叛，也必然和袁世凱時代一樣地遭受到人民的清算。」

這就是說：「救中國的，決不是依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及豪門、顯貴、軍閥、

買辦等的所謂改革。這樣的改革，是吞噬人民的惡鬼所戴上的假面。」（見同前「創世」）它的「走不通」以及因「走不通」而趨於失敗，是必然無疑的。

四 什麼東西妨礙着中國的變？

上面說來說去，好像中國就變不出一條路來似的；然則，中國到了今天，果真就沒有路可走了麼？不，決不是的，中國的路是有的，而且中國人民已經爲了這條路至少奮鬥了一百年，這就是民族獨立、人民民主與近代化之路，但在要達到這條道路之前，中國人民一定要澈底掃清妨礙着這條路的通過的東西，中國如果要變，就非首先把這些障礙物除去不可。那末，什麼是妨礙着中國變的東西呢？「拿今天中國的局勢來說，束縛着、阻礙着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有兩個基本因素：一個是我們傳統的社會生產關係（其關鍵爲我們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所有形態），另一個是帝國主義所加於我們的壓力（國際資本和不平等條約的壓力）。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又產生了一個新的第三因

素，就是所謂官僚買辦資本。這三樣東西也可說是妨害中國進步和近代化的三害。如果三害不除，我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可說是永遠無法完成的。」范承祥：「內戰論」，國訊，四五六期）爲什麼呢？因爲「中國當前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其直接的目的在於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壓迫，發展民族產業的資本主義。」（施復亮：「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觀察，四卷四期）「中國工業化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爲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完全成功，沒有一個推動並保護工業化的政權存在，中國雖然早已掛上了民國的招牌，可是實質上仍然還是一種封建性兼買辦性的官僚政治。這種政治會形成：第一是保護地主的利益，維持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制度；第二，是保護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充當帝國主義者的政治買辦和經濟買辦。中國地主和外國帝國主義者，都不願中國的工業化成功，也不願中國人民的生活改善，所以這種政治便自動地或被動地來阻礙中國的經濟改革。」（施復亮：「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展望，二卷三期）因此，「要決心今天的政治改革，就只有把騎在人民身上吃肉喝血的

封建勢力、豪門、權貴、軍閥、官僚買辦和帝國主義者，全都推翻，讓人民起來建立人民大眾的政權，這才是今天中國真正的行憲，也才是政治改革的唯一尺度。」（歐陽重光：「李宗仁當選以後」，創世，十六期）

這就是說：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資本已成爲妨礙今天中國變的東西，它們是革命的對象，上面三個革命對象不去，中國就休想變，中國人民就休想得到出路，這已是很明明白白的事實了。『至於目前所施行的所謂民主或「憲政」，那是絕對不能解決任何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和經濟的問題的。』（同前施文）

五 誰來領導着中國去變？

那末，誰來領導着中國去變呢？是所謂「自由主義者」「知識份子」嗎？是美國帝國主義嗎？是現政府當局嗎？不，如果根據前面的分析，這都不是的。於是有人說，領導着中國變的，是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呢？然而也又不是的，爲什麼？因爲「從歷史上

看，一切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都不能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其發展程度越落後，越缺乏革命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當然也不能有例外。」（同前施文）但也不能否認，民族資本家「雖然也是資產階級，却是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北平太平洋雜誌第四期）因此，「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任務，主要便不能不落在勞動人民的身上。」（同前施文）「在今天，只有農工大衆和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結合起來，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樊弘：「兩條路」，北大半月刊，四月五日）這因為『現在這時代可變了。不論叫「羣衆」、「公衆」、「民衆」、「大衆」，這個「衆」的確已經表現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前固然也潛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現在却強大起來，漸漸足以和統治階級對抗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強大。』（朱自清：「論不滿現狀」，觀察三卷十八期），總之，「救中國的，是中國的人民自己起來」（創世），這個人民，我以為除了前面所說過的「封建勢力、豪門、權貴、軍閥、官僚、買辦」等革命對象而外，是應該包括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份子、自由資

產階級，以及從封建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開明士紳等在內的，這是一個以勞動人民爲主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官僚買辦資本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同時，這也就是以勞動人民爲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六 用什麼方法來變？

用什麼方法來變，這也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照改良主義者的說法，最好是就現狀加以改良，要變而不亂，「革命」，但不是流血的，這實際上就是一條改良主義之路，這條路，由前面種種的事實來證明，是行不通的。所以北大樊弘教授說：「從政治上說，我以爲，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革命的路，一條是反動的路。反動的路，在把政權，放在剝削者階級手內，但叫剝削者階級自動的放棄他們的政權，或自動的限制他們自己的剝削，於以增進人民的福利。耶穌，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們所倡導的第三條路便是這一條路。」（樊弘：「只有兩條路」，觀察，四卷七期）

這條路的走不通，我們在前面已說過了。而據樊弘教授說，另外一條路就是革命的路，他說：「革命的路在把社會上被剝削的階層聯合起來，向剝削者階層以和平的或戰爭的手段，奪取政權，根絕或限制剝削者剝削的權利，於以保障被剝削者的生命、健康、與自由。」（見同上）樊弘教授在這裏所說的「和平」手段，就是要叫剝削者「同意革命」，這就是過去的「政治協商」的道路；然而這一「和平」手段，在今天亦證明其為不可能，而中國局勢的發展，事實上只剩下了兩條路：改良或者革命，即維持現狀或推翻現狀。因為目前「時局實在太緊張了，兩個陣營對壘已明朗化，非此即彼，和平的中間派，此巷無路。」（創世，四期）

『中國近代歷史的規律告訴了我們，每當我們遭遇到社會變革的嚴重關頭，永遠有「革命」與「改良」的兩種思想在爭議辯駁，而一到革命的聲音在表面上受到壓抑時，却也就正是改良主義的思想言論彷彿猖狂，而實質上更暴露出空虛、脆弱、偽善、卑鄙的時候，陪襯出唯有革命的主張纔是符合社會出路的真理，最爲廣大人士所真心接受。』

（田家蘇著：「論知識份子」，新知版）這就是說，解決今天中國出路問題的真理，是在革命的一邊，而不是在改良者的一邊。

七 中國要變成怎樣的國家？

中國將來要變成怎樣的一個國家呢，這也是曾經成爲爭論的問題，然而，現在則也差不多已成定論了，就是中國將來一定要變爲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既不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也不是英美式的資本主義，而是東歐式的新民主主義，這正就是燕大教授張東蓀氏在其「關於中國出路的眼光」一文中所說的，「……我的意思絕對沒有以爲中國將來的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與任何國完全不同。就類型來說，蘇聯是一個類型，英國亦是一個類型。此外還有一個類型，……這個類型就是戰後東歐幾個國家所實行的，他們自稱的，新民主主義。」「這只是講類型，並不是說，把本國的國情完全抹殺。恕我用一個不切的比喻，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講到定義，以爲類加差德。如云人是有

理性的動物，動物卽是類，理性是差德。人屬於動物一類，但他有理性，這是其特別的地方。以此比喻來說，中國就廣泛方面來說，是可歸入於這樣的類型，卽屬於這樣的一類；但就其特別的地方來說，不能不有其差德。」「再說一說東歐式的民主與蘇聯的不同點：第一，在政治上是不僅有一個黨（如蘇聯），而是多黨並存。只是因聯合而執行一個統一的政綱。第二，在經濟上是容納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資本，有些是國家資本，有些是合作社經營。至於土地則實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為如果把這幾點當作原則，這都是中國今後所當取法的。」（觀察，三卷廿三期）這是說，中國經過革命後，要在全國實行新民主主義，這就是中國人民的真正的出路。我很同意張東蓀先生的說法，卽他說「如果大家認爲這是一條路，大家應得暫時把不同的意見收起來，而齊向此爭取。所謂收起不同的意見，並不是不許人家立異，乃是必須出於各個言論家的自願。」因爲「意見一致，在主張上會發生一個力量。」（同上）

八 新形勢與「新政協」

根據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局勢實在已經到了最後攤牌階段的時候，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問題必須解決，在軍事上說，「戰局已走上一個新的關口。共方在江淮河漢間，牽制了大半國軍，而以其主要力量在北方，作決定性的一擊。」（薩利根：「半週軍事綜述」，時代日報六月二日）在政治上說，「自從政府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憲政以來，另一方則認爲你既在政治上攤了最後一張牌，那末，我也不能不攤出最後一張牌來，於是使有所謂號召「各方民主人士，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章明：「攤牌下的政治形勢」，展望，二卷七期）這就是目前中國的新形勢。

什麼叫做「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呢？據「時與文」三卷七期的「香港通訊」上所說：「……此運動起源於中共的「五一」勞動節口號。因爲其中的第五條爲：「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

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下香港一般熱心政治的人士都大為振奮，乃於六日集體發電毛澤東表示同意，一面並通電海外以資號召（該電另分送紐約馮玉祥、星洲陳家庚諸人），具名者都是上海不能活動的各在野黨派的領袖。

『至於該通電內容，除一貫的指責政府的言論外，值得重視的是：「……同人等日深焦慮，力圖對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中國共產黨五一勞動節號召第五項，……密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這個通電發出以後，各方人士和左派的報刊，都對這「新政協」的意義和其具體方面有所闡述和主張。十六日華商報以「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為題，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出席發言的有郭沫若、馬敘倫等二十二人，提出書面意見的有沈鈞儒、章伯鈞、譚平山三人，在左派黨會之間可說是極富代表性的，故極堪注意。其後民盟機關報「光明報」於第六期發表一篇社論，題為「新的政治協商與我們的工作」，中共機關報「羣衆」第六十九期亦發表了一篇題為「論舊政協與新政協」的論文。茲綜錄左派方面有關其

「新政」的較有代表性的議論如下：

「一、關於成份方面的意見有下面幾點：「前年的政協，是國民黨召開的，那時各黨各派承認國民黨是中國第一大黨。今天不同了，首先這個大黨就沒有資格參加。」其次，參加這個代表人民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份子，必須足以構成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有代表性的份子，無論怎樣寬大，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之外。」其三，「這一次的政協，是決不要代表地主買辦豪門資本的集團來參加的。」其四，「使全國工人、農民、獨立生產者、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社會賢達、愛國份子、海外愛國華僑，都能有代表在內。」

「二、關於任務方面的意見有下面幾點：「新政協」是以「團結全國民主階級……澈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真民主主義，在全國勝利為基本任務。」其次，「新的政協不僅是議事機關，而且是執行機關，……要草擬一個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條例，……其次就要草擬一個中國真正的民主憲法。」其三，「而其中心則

是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三、關於進行步驟方面的意見有下面幾點：「至於一切進行具體辦法，應候中共與民主陣營各方面及全國輿論共同往復商討抉擇。」其次，「準備新政協的召開，必須與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相結合，也就是說，必須在羣衆中廣泛的宣傳，準備着自己的要求以便向代表大會提出討論，從而組織其爲切身利益的鬥爭，使這個鬥爭提高和匯合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巨流，也要在討論和鬥爭中，發展組織，提出意見，選舉代表。」

「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以「新政協」相號召的分離運動，不但是由點而面的擴散，而還正在由上而下的滲透着。不久，「一個中國還是二個中國」的問題，恐怕會擺在全中國人民的面前了。」（五月廿日）

以上就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由來，及其正在醞釀產生中的情形。

九 歷史的路只有一條

毫無疑問的，中國人民解放的歷史的路只有一條，這就是中國人民必須澈底的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因為這是人民得以自由和平生活的前提。同樣毫無疑問的，在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與官僚資本作生死的鬥爭中間，沒有任何「第三條道路」存在。中國人民必須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人民當中的一切特權，這就是中國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份子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民主路線，他們要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真正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政府，而這個國家和政府是完全屬於人民大眾的。這是今天中國唯一的出路！也就是中國人民的歷史的道路！

新認識
叢書之三

論優生學與種族歧視

周建人著
基價二元四角

優生學，如本書作者在序裏說：「它非常錯誤地常常對國內把社會裏受壓迫而地位低落的人看作遺傳性低劣，把壓迫者看作遺傳性優秀者；對國外，把壓迫民族（或種族）看作優秀民族，被壓迫民族為低劣民族來立論，影響所到，遂對內替惡毒的統治者，對外給兇殘的帝國主義做了辯護士與代言人……」

這一種學說，使有些人的思想混亂，有些人則嚴重中毒。本書作者用極正確的生物學觀點予以駁斥，並指出它的錯誤所在。

本書共分六章：（一）論優生學的政治性（二）論優生學中的遺傳問題（三）論個人性質與社會條件的關係（四）論所謂優異家與劣等家族（五）論種族歧視（六）達爾文學說應用到人類社會上來的錯誤。



新 知 書 店

發 行

新認識
叢書之一

論胡適與張君勱

夏康農 著
基價二元四角

這是一冊有益而富於啓發性的小書。作者在小序中說：「胡張兩位博士在思想上以及對於「文化」的看法上，本來是居於背道而馳的兩極；今天在政治行動上他們可是沆瀣一氣，融和無間。……兩位博士一位已經是「制憲」專家，一位可能是將來「行憲」的大吏，此地兩「賢」合傳，應當是件「美」談。」

本書集「論胡適」及「論張君勱」兩篇而成；前篇內容包括（一）

前言（二）論其人的特性和通性並勾畫輪廓（三）「拿證據來！」

（四）結論。後篇內容包括（一）破題（二）起講（三）尾聲。



新 知 書 店 發 行